山西汾阳东龙观宋金墓葬出土瓷器的产地问题探讨

孟耀虎

内容提要　洛阳东龙观墓地是唐代到清代的一座大型墓地，在宋金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较多的瓷器，原报告对极少数瓷器作了产地推测。为了全面了解出土瓷器的产地问题，本文进行了系统探讨，认为其中存在北宋洪山窑场产品，金代随葬瓷器主要为金代介休城内窑场产品。

关键词　汾阳东龙观墓地　瓷器　北宋介休窑　金代介休窑

汾阳东龙观墓葬是2008年下半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汾孝大道建设进行的考古发掘。2012年7月已有《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报告出版[1]。此次发掘主要对象是古墓葬。发掘者将其分为四个区域，分别为东龙观段、西龙观段、团城北段和团城南段。报告以东龙观北区、东龙观南区、西龙观区、团城北区和团城南区五部分展开。东龙观北区和南区是这次发掘的重点地区，宋金墓葬主要集中在这一带；西龙观区为一些小型唐墓；团城北区和团城南区为元代至清代的墓葬。

在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不少瓷器，全部为北方地区的产品。报告者除了确认两件青釉印花小碗为耀州窑产品和一件细白瓷灯盏为霍州窑产品外，对大多数瓷器没有进行产地方面的探讨，故此，笔者想就这批出土瓷器的产地问题作一些讨论。

西龙观为唐代小墓，团城北区、团城南区为蒙元以后至清代的墓葬，不作为这次讨论的对象。东龙观北区全部为宋金墓葬，出土瓷器概况见〔表一〕。东龙观南区以M12为界，北部为金代墓葬，南部为蒙元及以后墓葬。因此，讨论的直接对象是东龙观南区M12以北（包括M12）的金代墓葬，出土土瓷器概况见后文〔表二〕。

1. 四十八号墓（M48）

M48出土的两件青釉小碗〔图一：1、2〕，报告者认为是北宋晚期耀州窑产品，应当是比较可靠的，不再赘述。黄绿釉方形枕为束腰三彩枕〔图二〕，周身印花，竖烧，枕两侧各有烧造时的支钉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文物出版社，2012年。

书籍2.indb 118　14-11-10 下午4:25

痕三个。以往这类枕头多被认为是河南新安窑的产品[1]，杨永德先生捐赠南越窑博物馆的束腰形枕有几件的产地也标示为河南新安窑[2]，时代定为北宋。山东淄博的博山窑出土的三彩器物较多，其中也有这样的束腰枕[3]，时代定为金代。三彩束腰枕一般都施满釉，因资料有限，仅靠胎质胎色、艺术风格目前还不足以分辨出哪些产品是出自新安窑哪些产品是出自博山窑或者其他窑场。茶叶末釉罐〔图三〕发色泛灰，器形较小，隐圈足内施釉，足背部分露胎。由于烧造气氛等原因，目前还不能完全确认产地，推测可能为介休洪山北宋窑场生产。介休洪山茶叶末釉的烧造已经具备了很高的水平，而且窑场距离汾州也很近。虽然交城窑在北宋时也烧造瓷器，但窑址标本并没有见过茶叶末釉的器物。因此推测该罐可能不是交城窑的产品。M48出土的另外五件瓷器包括两件盘〔图四：1、2〕和三件碗〔图五：1、2、3〕，全部为细胎瓷器。其中，四件为葵口，三件腹部有压棱纹。每件器物的足背上都还粘有不规则的锥状支钉，器内除标号为M48：2的盘以外皆有三支钉痕。胎质细腻但略显疏松，釉色有的泛黄。标号为M48：01的碗为六出葵口，与之对应的碗外壁有六道压棱纹，足背上也有对应的六处凹槽痕。足背的凹槽中有釉水存在。可以判断出压棱纹是在施釉前由辅助机械或模具压出。介休洪山窑标本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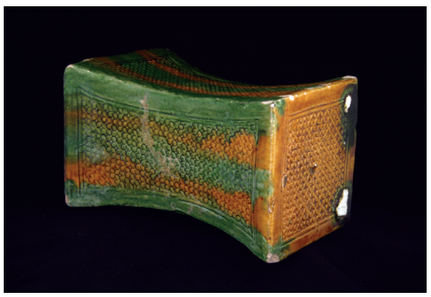
〔图一:1〕M48出土青釉印花小碗（M48:11）



〔图一:2〕M48出土青釉印花小碗（M48:13）



〔图二〕M48出图黄绿釉方形枕（M48:10）



〔图三〕M48出土茶叶末釉罐（M48:14）



〔图四:1〕M48出土白釉盘（M48:2）



〔图四:2〕M48出土白釉盘（M48:3）



‹1› 王卫丹：《宋金元三彩枕的分类与产地》，《收藏》2011年第9期。

‹2› 《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页169、172、174，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宝法德企业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93年。

‹3› 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山东"卷，页162，科学出版社，2008年。

书籍2.indb 119 14-11-10 下午4:26

〔图五:1〕M48出土白釉碗（M48:1）



〔图五:2〕M48出土白釉碗（M48:01）



〔图五:3〕M48出土白釉碗（M48:4）



〔图六〕M43出土白釉剔花腰圆枕（M43:01）



与此类碗、盘完全一致的器物，葵口、压棱纹、胎质、釉水以及化妆土成分的不规则、锥状支钉等特征和工艺风格均显示，M48的这些碗、盘，都应当来自北宋晚期的介休洪山窑场[1]。

2. 四十三号墓（M43）

M43位于金代墓区范围，因为早年迁葬，墓内仅剩一件白釉剔花残瓷枕〔图六〕。此枕枕面有单线阴刻边线，主题纹饰为剔地的勾划莲纹，以茨菰纹为辅助纹饰，黄白胎，釉色泛黄，气孔设在枕背后中部。从残枕枕面侧抹釉、胎釉、装饰风格等特征看，无疑为介休窑北宋时期产品[2]。

［表一］**汾阳东龙观北区墓葬出土瓷器统计表**

序号	单位	出土瓷器	时代
1	M48	白釉碗M48:1;白釉碗M48:4；白釉碗M48:01；白釉盘M48:2；白釉盘M48:3；青釉印花小碗M48:11；青釉小碗M48:13；黄绿釉方枕M48:10；茶叶末釉罐M48:14	北宋
2	M1	白釉碗M1:3；白釉碗M1:12；白釉碗M1:10；白釉碗M1:11；白釉碗M1:19；白釉碗M1:21；白釉碗M1：22；白釉盘M1：13;白釉盘M1:15；白釉盘M1:20；白釉黑花腰圆形枕M1:17；三彩腰圆形枕M1:9	金
3	M40	白釉碗M40:1；白釉黑花盘M40:6；白釉钵M40:3；白釉黑花腰圆形枕M40:4；白釉黑花加彩腰圆形枕M40:5	金
4	M41	白釉碗M41:1-2；白釉盘M41:1-1；白釉黑花腰圆形枕M41:2	金
5	M42	白釉碗M42:2-2；白釉盘M42:2-1；白釉钵M42:3；白釉黑花腰圆形枕M42:1	金
6	M43	白釉剔花腰圆形枕M43:01	北宋
7	M44	白釉碗M44:3；白釉盘M44:2；白釉钵M44:1	金
8	M45	白釉碗M45:3；白釉碗M45:01（当为盘）；白釉碗M45:03（当为盘）；白釉碗M45:02；白釉钵M45:1；白釉黑花加彩腰圆形枕M45:04；白釉黑花腰圆形枕M45:2	金
9	M46	白釉碗M46:01；白釉盘M46:02	金

‹1› 孟耀虎：《介休窑白瓷品质》，《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333－348，上海博物馆，2005年。按：早前发表资料中的介休窑白瓷，几乎全部为介休洪山窑场的产品。因为当时认识的不足，将其时代界定在北宋至金代。近年的研究表明，介休洪山窑场的烧造最为辉煌的时间是北宋，金代时该窑场不再烧造瓷器。介休金代烧瓷窑场转移到现在的介休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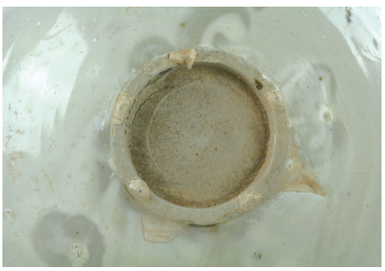
‹2› 孟耀虎：《北宋介休窑瓷枕》，《映像》2012年第5期，页104－107。

书籍2.indb 120 14-11-10 下午4:26

〔图七:1〕M1出土白釉盘(M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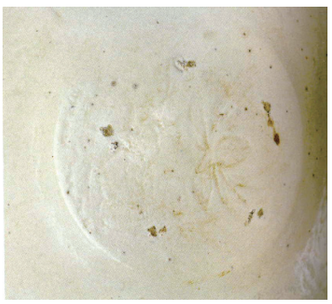
〔图七:2〕M1出土白釉盘(M1:13)底足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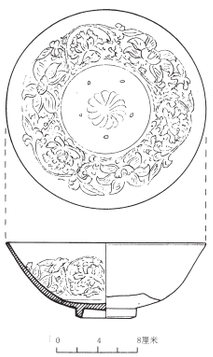
〔图八:1〕M1出土白釉碗(M1:22)



〔图八:2〕M1出土白釉碗(M1:22)底足细部



〔图九〕M1出土白釉盘(M1:21)印花图案



3. 一号墓(M1)

M1出土碗、盘10件。胎质较粗，釉色泛青灰。足背都有五或六个支钉痕；有的支钉还粘连在足背上〔图七：1、2〕。支钉由化妆土掺和砂子制成，较粗糙。碗盘内多数有和足背相一致的五或六个支钉痕〔图八：1、2〕，其中两件(碗、盘各一件)器内底没有支钉痕迹，推测可能是正烧时摞在最上面的(报告者认为编号为M1：15的盘，器内有两个支烧痕，笔者认为应当为落砂而非支钉痕)。这些碗盘都施化妆土，多数有淌釉现象。六件碗盘有印花，印纹因在化妆土下面，图案因此模糊不清；纹饰题材有缠枝或有界隔的菊花、莲花、牡丹〔图九〕。从整体的特征观察，这批碗盘全部为介休金代窑场产品。2004年介休老城南街在城市改造中发现了金代烧瓷的窑场，碗、盘类器物标本和这些墓葬出土物特征完全一致[1]。

白地黑花腰圆枕〔图十〕枕面绘折枝花卉，枕面两侧抹釉露出化妆土，黄白胎，釉水泛黄，气孔在左下侧。这种特征的标本在介休洪山和介休城南街都没有发现过。以前一直不明白是何处所生产，后来发现其绘画风格和介休城南街烧造的盘内壁黑画花比较一致，再仔细考察，发现它在工艺上和北宋介休洪山的瓷枕有联系。两者在枕面的两侧都有抹釉的手法，可能这是出于支烧工艺上的需要，具有特定的地域风格。虽然介休城南街没有发现瓷枕标本，但确认这类枕头为这里烧造应当是相对可信的[2]。

三彩腰圆枕〔图十一：1、2〕枕面主题纹饰为剔划花麒麟童子，枕身中部为模印花草并施黄釉，浅砖红胎。这种风格的低温釉枕在吕梁地区的文水、汾阳、离石一带常有出土，正式发表的资料有

‹1› 孟耀虎：《介休市南街古瓷窑》，《文物世界》，2004年第6期，页55－59。按：早年对介休窑的认识是以前辈们写就的《中国陶瓷史》(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为依准，所以以前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介休窑为宋金时期窑场。在发现介休南街古瓷窑时，依据出土的碗、盘、钵等标本的情况，在报道时将其时代顺延至元代。这里特此更正：南街古瓷窑为金代。而金代时，传统意义上的洪山介休窑处于停烧状态。

‹2› 孟耀虎：《金代介休窑瓷枕》，《映像》2012年第1期，页072－077。

书籍2.indb 121 14-11-10 下午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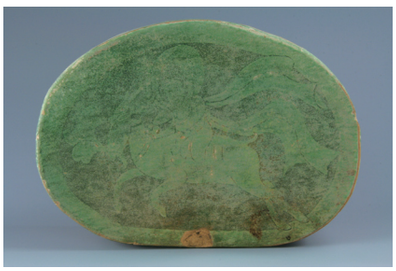
〔图十〕M1出土白地黑花腰圆枕（M1:17）



〔图十一:1〕M1出土三彩腰圆枕（M1:9）



〔图十一:2〕M1出土三彩腰圆枕（M1:9）枕面



〔图十二〕M40出土的碗（M40:1）



〔图十三〕M40出土的盘（M40:6）



〔图十四〕M40出土的画黑花盘（M40:6）内底细部



吕梁离石出土的一件‹1›。离石出土的三彩枕在剔划花和枕身印花、施黄釉方面都和这件器物比较接近，只是枕面的剔划花是在C形壶门内完成的。这种风格的低温枕还见有全部施绿釉的，也有施化妆土素烧后不再施低温釉烧造而直接进入市场的素白枕，应当是不成熟的产品。至于其产地，目前还没有可靠的线索，很有可能在介休、交城至离石一带。就其流畅的剔划花风格和构图的组成观察，基本上排除是外省烧造的可能。

4. 四十号墓（M40）

该墓同出有正隆四年(1159)刻铭的澄泥砚，表明该墓的年代不会早于正隆四年，对我们研究这个墓地出土瓷器的时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M40出土的碗、盘足背分别有六个和五个支钉痕〔图十二，图十三〕。碗的足背上六个支钉还全部存在，盘子的足背上仅剩下支钉痕迹。该墓出土的绘黑花盘在介休城南街窑址采集到的标本中也没有见到。然而该墓出土的黑绘折枝菊花的盘〔图十四〕与介休城南街窑址标本中的盘、碗在支烧工艺和胎釉特征上较为一致。大的碗、盘支钉就多，有时多达七个，且制作的支钉比较粗糙，胎质略粗，器外腹近圈足部分常有釉水不均形成的泛青灰现象。因此，推断该墓出土的这件绘黑花盘为介休城内南街窑场的产品可能是相对客观的。

钵〔图十五〕为敛口，腹部微鼓，芒口，足背看不到支钉痕，腹部有瓦棱刻纹，黄白胎，有淌釉现象。和介休城南街窑场标本一致，可以确认为介休城南街窑场产品。

‹1›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山西”卷，页75，科学出版社，2008年。

书籍2.indb 122 14-11-10 下午4:26

〔图十五〕M1出土的钵（M40:3）



〔图十六〕M40出土的画花瓷枕（M40:4）



〔图十七〕M40出土的画花瓷枕（M40:5）



〔图十八〕M41出土的瓷枕（M41:2）



〔图十九〕M42出土的钵（M42:3）



〔图二十〕M42出土的白地黑花腰圆枕（M42:1）



该墓还出土有两件画花瓷枕〔图十六、图十七〕。在枕面阴刻花式边栏内画折枝莲为主题纹饰，辅以茨菰纹。两枕的共同特征是枕面两侧都抹去釉水，气孔留在左下侧近底处。黄白胎。釉水泛黄。推测为介休城内南街窑场生产[1]。

5. 四十一号墓（M41）

M41出土碗、盘足背和器内底都有六个支钉痕。碗的足底也有施釉现象，从器内残留支钉特征观察，也应为介休城内南街窑场生产。盘子的全部特征更是和介休城内南街窑场相同。

瓷枕〔图十八〕特征与M40所出土者相同，为介休城内南街窑场产品。枕面左侧抹釉旁有粘连痕迹，可以确认枕面两侧抹釉是和摞烧有关。

6. 四十二号墓（M42）

碗的足背和内底都有六个支钉痕。盘子的内底有六个支钉痕，而足背看不到明显痕迹。胎釉特征显示其为介休城内窑场产品。钵〔图十九〕为敛唇口，垂腹，胎釉特征显示其亦为介休城内窑场产品。

白地黑花腰圆形枕〔图二十〕的特征与M1、M40、M41同类枕一致。为介休窑城内窑场产品。

7. 四十四号墓（M44）

M44出土碗、盘足背和内底都有六个支钉和支钉痕〔图二十一、图二十二〕。支钉和近底部泛青灰的特征都表明其为介休城内窑场的产品。白釉钵〔图二十三〕芒口微敛，深腹，窄圈足。器底施釉，

‹1› 前揭《金代介休窑瓷枕》。

书籍2.indb 123 14-11-10 下午4:26

〔图二十一〕M44出土的碗（M44:3）



〔图二十二〕M44出土的盘（M44:2）



〔图二十三〕M44出土的钵（M44:1）



〔图二十四〕M2出土碗（M2:06）



〔图二十五〕M45出土碗（M45:02）



〔图二十六〕M45出土钵（M45:1）



〔图二十七〕M45出土枕（M45:2）



〔图二十八〕M45出土枕（M45:04）



〔图二十九〕M45出土盘（M45:01）



〔图三十〕M45出土盘（M45:03）



足背刮削无釉，器表有“泪痕”。器内有拉坯痕。胎体细腻，制作规整，属于细瓷。器物外表可以看到因利坯而露出的不规则凹坑和裂隙，这说明器物胎质不够致密。这件钵和其他可以确认的介休城内窑场所生产的粗胎碗、盘完全不同，经过对实物的观察，推测其为霍州窑产品。

8. 四十五号墓（M45）

M45出土有两件碗〔图二十四、图二十五〕、两件盘、一件钵〔图二十六〕、两件枕〔图二十七、图二十八〕。是东龙观墓地碗、盘、枕的标准的随葬。报告者可能看腹部比较深的原因，将编号为M45：01〔图二十九〕和M45：03〔图三十〕的盘识别成了碗。碗、盘的足背上都有较具特征的介休城内窑场的支钉或支钉痕，器物底部和圈足部分泛青灰或黄白色，推测为介休城内南街窑场的产品。钵为细白瓷，釉水有“泪痕”，胎质细腻但不够致密，和M44出土的细白瓷钵特征一致，只是器形要大于前者，应当也是霍州窑的产品。

两件瓷枕都为介休城内窑场的产品，以折枝牡丹为装饰主题，绘画手法成熟，图案疏密有致，

书籍2.indb 124 14-11-10 下午4:27

〔图三十一〕M46出土碗（M46:01）



〔图三十二〕M46出土盘（M46:02）



〔图三十三〕M2出土盘（M2:04）



〔图三十四〕M2出土碗（M2:06）



〔图三十五〕M2出土的绿釉枕（M2:07）



繁而不密，体现出了介休城内窑场最为成熟时期的水平，和其晚期绘画简略粗糙的风格截然不同。其中一件还使用了套色手法，以黑色画出筋叶和花蕊，两朵牡丹用赭黄色绘画，整个画面显得活泼而有生机。这种套色的绘画装饰技法在山西南部、东南部，河南西北部的金代瓷器中也曾被大量使用，但各地的风格不尽一致。该技法在明代的磁州、河南的禹州更是被使用普遍。

9. 四十六号墓（M46）

M46出土瓷器为盘〔图三十一〕、碗〔图三十二〕各一件。但皆出土于墓道填土中，有别于其他墓随葬品放置于墓室内的情况。碗、盘的足背上都留有支钉，粗糙而不规则，系用化妆土掺砂子制成。这两件器物属于介休城内南街窑场的产品无疑。

〔表二〕汾阳东龙观南区墓葬出土瓷器统计表

序号	单位	出土瓷器	时代
1	M2	白釉碗M2:01（应为盘）；白釉碗M2:02；白釉碗M2:05；白釉碗M2:06；白釉盘M2:03；白釉盘M2:04；绿釉黑地腰圆形枕M2:07	金
2	M3	白釉碗M3:1；黑釉兔毫碗M3:2（被盗扰）	金
3	M5	白釉碗M5：2；白釉盘M5:07；黑釉盏M5:06；绿釉划花牡丹纹八角形枕M5:02	金
4	M6	白釉碗M6:01；白釉碗M6:1；白釉盘M6:02（被盗扰）	金
5	M12	白釉碗M12:01（盗洞内出）；白釉黑花盘M12:1（被盗扰）	金

10. 二号墓（M2）

M2出土碗〔图三十三〕、盘〔图三十四〕各三件。足背和器内都有粗糙的支钉或支钉痕五或六个。黄白胎表面泛青灰，其中三件有模糊的化妆土下印花，具有较典型的介休城内南街窑场产品的器物特征。

书籍2.indb 125 14-11-10 下午4:27

〔图三十六〕M3出土的白釉碗（M3:1）



〔图三十七〕M3出土的黑釉碗（M3:2）



一件绿釉枕〔图三十五〕和M1：9属于同一种类型。报告中的“绿釉黑地腰圆枕”之“黑地”应当是胎体本身的土黄色在覆盖绿釉后形成的，和剔地填黑彩在工艺上是不一样的，将其称为“绿釉剔划花腰圆形枕”可能更妥，其烧造地点很有可能在介休、交城至离石一带。

11. 三号墓（M3）

该墓出土有“正隆六年(1161)二月二十三日”买地券，对考古研究有重要价值。该墓发掘前已被盗扰。

M3共出土有两件碗，口径都不超过12厘米，应当属于茶盏的尺寸范围。白釉碗〔图三十六〕依报告，足背有五个支烧痕，笔者没有看出来，内底也没有支钉痕迹。但规矩的挖足和器物下部的青灰胎色，体现出这件器物是介休南街窑场的产品。黑釉碗〔图三十七〕，黄白胎，施釉至底。足背上看不到支钉痕迹，可能是单匣装烧。其胎釉特征接近于介休洪山北宋窑场所生产的黑釉器物，但相对要粗糙。推测为介休城内窑场生产的产品。

12. 五号墓（M5）

该墓出土有“明昌陆年(1195年)伍月拾贰日”的纪年买地券，对墓葬的系统研究有重要意义。

M5出土白釉碗〔图三十八〕的足背支钉痕迹不明显，可能因使用而磨损，但还是可以分辨出有六个支钉痕迹；内底也有六个支钉痕迹。白釉盘〔图三十九〕的足背和内地都有五个支钉痕，可能为介休城南街窑场的产品。黑釉灯盏〔图四十〕器形较小，是宋金以及后来元明清常见的灯盏，几乎各地窑场都烧造，推测为汾州附近窑场烧造的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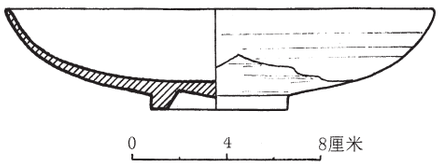
绿釉枕〔图四十一〕为八角形，黄白胎夹有沙粒。在枕一侧有三个支烧痕，可以看出是竖向入窑烧造，这也是低温枕常见的装烧方法。枕面为刻划纹饰，随八角有两层双勾阴线将装饰分为内外两层。外层为水波纹，中部为主题纹饰，划刻牡丹纹并以似篦划线的线刻为底纹。牡丹纹线条流畅，展示出刻划者娴熟自如的手法。山西诸窑目前不见有生产该类装饰形式产品的窑场，或者窑场生产低温釉枕，但不见有类似风格的产品。霍州窑也仅见少量低温枕标本。河北磁州窑的瓷枕未见和此

书籍2.indb 126 14-11-10 下午4:27

〔图三十八〕M5出土的白釉碗（M5:2）



〔图三十九〕M5出土盘的线图（M5:07）



〔图四十〕M5出土的黑釉灯盏（M5:06）



〔图四十一〕M5出土的绿釉枕（M5: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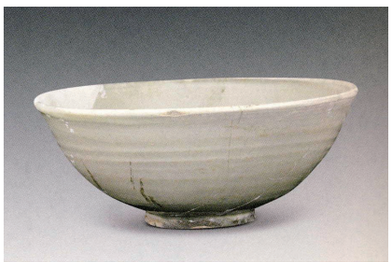
枕一致者，日前所见河南资料也未显示具体哪个窑以此风格为装饰主流。山西西北部一带，金元时期常见这种以线刻主题花纹而填平行地纹的装饰器物，以瓶、罐类为多，但由于资料所限，目前并不能确认这类枕头是这里烧造的。该枕的装饰手法十分成熟，推测应由较大的窑场生产——或为河北磁州窑，也可能为河南窑场，也有可能就是山西西北部一带的窑场，目前尚不能得出可靠结论。

13. 六号墓（M6）

此墓被盗扰。在盗洞中发现有两件瓷器，为碗和盘，皆残〔图四十二，图四十三〕。两件器物胎质较粗。器内底有六支钉痕。足背有椭圆形支钉痕六个。完全符合介休城内窑场所烧造的产品特征。从这两件碗、盘的特征分析，应当属于该墓随葬品，可能因为其质量低劣而被盗墓者遗弃。另一件碗为细胎瓷器〔图四十四〕，出土在墓室内灯台旁边的淤土中。口径8.8厘米，应当属于灯盏类。胎质粗糙，有疏松之感。釉水不均，泛黄。内底有因抹釉而形成的不规则圆形涩圈。这种抹釉的涩圈工艺，在北宋介休洪山窑场施化妆土类的粗瓷器物中曾大量使用。在霍州窑中，细白瓷也有不少采用这样的工艺烧造。报告者推测为霍州窑早期产品，笔者经过对实物观察，认为报告者的推测应当是可靠的。

书籍2.indb 127 14-11-10 下午4:27

〔图四十二〕M6出土的白釉碗（M6: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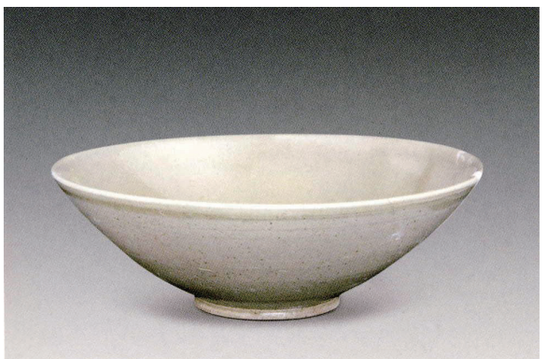
〔图四十三〕M6出土白釉盘（M6:02）



〔图四十四〕M6出土白釉碗（M6:1）



〔图四十五〕M12出土的白釉盘（M12:01）



〔图四十六:1〕M12出土白釉黑绘花盘（M12:1）



〔图四十六:2〕M12出土白釉黑绘花盘（M12:1）内底细部



14. 十二号墓（M12）

此墓曾被盗掘，盗洞中出土一件碗〔图四十五〕。外壁不施化妆土，内底有同心圆刮圈。釉水泛黄。应当是该墓下葬时的随葬器物，符合金代碗的特征。另一件盘出土在墓室内〔图四十六：1、2〕胎质略粗，外表泛灰。外壁施半釉。器内和足背都有五个支钉痕。内底黑绘变异的折枝花草。足背的白色化妆土掺砂的支钉痕迹和内底的绘画风格以及泛灰的胎体，都充分体现了介休城内窑场的产品特征。

通过对东龙观北区和南区宋金墓葬随葬瓷器的观察，可知其主要是碗、盘、枕的基本组合，只是数量上有些多少的区别。北区的M44，死者为20－23岁的女性，为匍匐状葬式，属非正常性死亡，在随葬器物中没有枕。M46瓷器出土于墓道填土中，有别于其他墓葬，也无枕。南区的M3、M6、M12因为盗扰，没有发现枕，很可能已经被盗墓者盗走。其他墓葬全部是碗、盘、枕的瓷器随葬组合。汾阳一带古墓葬中常常以瓷枕随葬。明代时已经有墓葬发现瓷枕的记载。谭元春《潜刻右丞墨迹歌小引》记：“王右丞维因其父官司马，徙家汾州，然实祁人也。我明万历间，祁阎氏筑宅忽地

书籍2.indb 128 14-11-10 下午4:27

陷，得骼衬，宛然中有瓷枕，枕上有剔银灯词，乃右丞夫人闻金泥喜信作也。其邑人无言。李公嗜古之士，悯然有水流灯焰之感，倡祁上同志敛钱改厝……”‹1›近十多年来，笔者所见相传汾州出土瓷枕不计其数，大部分应当都是盗掘出土。

香港九如堂收藏有一件白地黑花瓷枕，底部墨书“大安元年(1209)十月十日置”‹2›。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白釉盖罐，盖沿内面逆时针方向墨书“史良母陈氏大定二年二月十四日身亡记”纪年‹3›。这都是可以确认的介休城内窑场烧造的常见器物，对研究介休金代瓷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汾州为孝昌二年(526)置，领西河郡(今汾阳)。唐武德元年(618)郡改称浩州，三年后复置汾州。天宝元年(742)改汾州为西河郡。乾元元年(758)复名汾州。唐肃宗上元元年(766)县名改称西河，汾州治仍在县城。唐末汾州辖介休、平遥、孝义、西河、灵石，五代、宋、金辖区基本一致‹4›。

介休城内窑场发现以前，汾阳一带出土的大量瓷器没有人知道其产地。笔者以为当地有窑场，曾向汾阳文物部门和爱好者了解。或有人以为在峪道河一带可能烧瓷，但始终没有发现相关窑场。2004年在介休城南街城市建设的楼基中发现了金代窑址，在很薄的明清老城地层下，有大约四米的厚度皆为金代窑址堆积。这一发现为笔者在一段时间后确定汾阳一带宋金墓葬出土瓷器多数为介休窑烧造的产品提供了直接依据。汾阳为宋、金时期的政治、经济中心，故此，汾阳一带多有为官者和富裕者，死后墓葬中随葬器物相对丰富或级别较高。而彼时的汾阳以外的平遥、介休、灵石、孝义，则多数随葬灰陶或一般低档器物。

[作者单位：山西省文物鉴定站]

(责任编辑：项坤鹏)

‹1› (明)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卷三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四库全书》本。

‹2› 李略鸣：《九如堂古陶瓷藏品》页355，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

‹3› 霍吉淑：《大英博物馆所藏明代以前白瓷》，上海博物馆编：《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423，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页53，文物出版社，2004年。

‹4› 山西省地图编撰委员会：《山西省历史地图集》页68—71，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年。

书籍2.indb 129 14-11-10 下午4:27